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

目 录

- 创办西江乡村师范学校的回忆……陈洪有（1）
- 西江乡村师范学校的回忆……梁阳可羽（9）
- 忆述西江乡村师范……林达天（35）
-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前前后后
情况的回忆（十三）……谢 悦（42）
- 我当县立女中首任校长的经过……汤慕兰（48）
- 新会县篮球运动发展概况……林智文（51）
- 新会中医师公会会长郑德如
……何坤巽（54）
- 解放前新会城的慈善机构……伦海滨（57）
- 兴建新会书院的经过……（63）

创办西江乡村师范学校的回忆

陈洪有

西江乡村师范学校，一九三二年春设于江门郊区的篁庄乡，一九三五年春迁到番禺县鱼窝头，也称做西江乡村师范。同年秋撤到广州南市，一九三六年被迫停办。从开办至结束仅四年多。该校校舍和设备，当时都因陋就简，只是我们当时一班教师在教育思想上多受陶行知先生的影响，在办学方面我也按照他的办法去实践，因此在当时遭到旧势力的嫉视不得不停办。现在仅就个人回忆创办这间学校的起因和一些教育方法记述出来，或者还有些历史意义。

（一）

我读小学时期正值“五四”运动，初步受到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影响。后来在新会县立一中读书，又遇到“省港大罢工”，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我除了和同学参加当时各种集会游行活动外，还创办“新中国书报社”、“贫民识字班”、“平民学校”等，企图通过教育唤起民众，共同救国。随后“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热潮越来越高，为了寻求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九年夏我抛弃家庭，只身跑到上海，曾做过临工，半工半读，后来终于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师范班，完成了四年大学课程。那时我先后邀约了新会中学的廖北和、梁朝

令、叶渠均、西南（冈州）中学的朱贤锦、朱贤寿、莫仲义，新会师范的区巾雄等数十人到上海读书。我们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共同研究讨论革命的理论 and 道路，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当作救国良方去探索。我们办工人夜校，出版刊物，还参加过工人秘密迎接北伐军的活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怀疑我是赤色分子，一天深夜，军警到劳动大学将我逮捕。后来查无证据交保释放。在白色恐怖的黑暗里摸索的时候，读到陶行知先生的关于生活教育和《中国教育改造》等著作启发了我。我想到国民党反动势力控制的大城市，我们对城市不熟悉，不容易活动，我们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我们要学习陶行知先生从事乡村教育工作，进行社会改造活动。为了进一步了解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理想与教、学、做的实践，决定约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到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去学习。

一九二八年底至一九二九年的年假期间，我与廖北和、梁朝令、叶渠均等同学到了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先生在茅草盖顶圆形的礼堂——犁宫门口迎接我们。我们将拟返农村办学的想法请教陶行知先生，得到他热情的鼓励。并说他有一个宏大的志愿：“要办一百万所学校，去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充分的新生命。”又说：“晓庄乡村师范就是实现这个志愿的第一步。”他介绍晓庄师范的教育方针和方法，说：“晓庄实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教育必须和实际生活相结合’，学校分别设工艺、农事、音乐三个组，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志趣选学，各组设指导员指导学生进行学

习。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在做上学，边做、边教、边学，如农事组的生活表，根据农活季节编写，教学做的主要场所是在稻田和菜园里，雨天不能下田才在室内对照书本学习。”

“学生选定一个农村办一所小学作为实验‘教学做合一’的场所。师生还到社会上去，到农家去。如在茶馆讲《水浒》讲《说岳》，是很受群众的欢迎。讲时将人名、地名、物名……写成识字牌，又进行了识字教育。”

我们在晓庄，早晨参加陶行知先生率领师生在犁宫前面的空地上集合唱《锄头歌》的朝会。日间到工艺场或菜园里跟师生们一起劳动一起上课。晚上到农民夜校及茶馆里听讲，听的人有老有少，学习都很认真。

陶先生抛弃大学教授优越生活的，改穿平民衣服，赤脚穿草鞋，深入农村办学，随同师生一起劳动，做师生的榜样，这种献身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那时其它地方也有人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后来我们也参观过昆山的新村，徐公桥的社会教育实验区，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平民识字运动等与晓庄师范作比较，我们认为晓庄师范的道路才是我们将来办学的榜样。但是觉得仅仅几天的参观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派人到晓庄作长期的学习，才能深入体会它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做的方法，特别是陶先生的革命精神。刚好叶渠均的爱人区巾雄从新会师范高中毕业后到上海考大学，我们建议她到晓庄师范去学习，她不辜负朋友的期望，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到晓庄师范被反动政府封闭时止共一年多时间，在那里进行刻苦深入学习，将在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的种子带返新会，与我们一起创办西江乡村师范。

(二)

一九三一年夏，我们几个同学在劳动大学毕业，就决定按照我们的理想回到家乡办晓庄式的学校。先是在新会师范谋得做教师的职位作立足点，同时着手筹备西江乡村师范。当时政府规定办中等学校必须呈报教育厅批准才能招生。那时虽然广东成立西南政府，由陈济棠统治。但我们那时没有社会经验，便根据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原则，连晓庄师范用的名词术语都搬到我们草拟的西江师范的章程中去，带去广州，经朋友介绍见到当时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他看了我们草拟的章程后即指出说：（1）晓庄师范被政府封闭，不能写学习晓庄和有关晓庄的话；陶行知被通辑，也不能写有关学习陶行知的的生活教育等话，缘起中这话要删去，重新改写。（2）要依照教育厅公布改进全省中等学校方案，先成立学校董事会，然后依照学校组织规程成立学校。我们得了教训，回来斟酌修改，便改头换面，不能把晓庄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革命的精神”、“劳动的身手”等教育方针写上，我们便改写成“科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革命的教育”、“劳动的教育”。不能写“教学做”，我们就改写采用辅导法，酌用道尔顿研究制的外国时制教育方法写上去。学校课程，只能照抄教育厅颁发的乡村师范第四类课程表了。同时拉了一些社会有地位的人来当校董。才得到教育厅批准备案。

(三)

那时新会和江门中等学校很少，乡村师范学校只有一间。

在教育方面，我们还是根据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精神办西江乡村师范学校。师生实行“五同”——同食、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办义学兼做农村社会改造工作。

(1) 师生同食、同住、同劳动：全体师生都住在学校里，共同睡在几个大宿舍里。学校没有用一个工人，连厨工也没有，全体师生在学校食饭，师生合组当值日，合办伙食，一同到市场采购、煮饭，师生同桌食饭，用公筷合食，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轻的校务劳动如抄写文件，管理图书，清洁地方等，重的如下农场种菜、种花，到畜牧场养鸡、养猪和开筑道路等等，那时学校运动场，就是由师生共同锄掘后山开辟的。这是西江师范学习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动上劳心”的实践。在做中学，学知识，学劳动技能，学好思想品德。在公共生活中处处都会表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品德的好坏，比如师生同食，用公共筷子合食同桌送菜，与分菜一人一份坐在一桌食饭，意义就大不相同。分菜食饭各食各的，没有思想品德问题，合食如果有人经常多占，就有思想问题，发现这种情况，可以用表扬和批评的方法，促使改进。思想品德可以言教，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做表率，还可以用集体的表扬和批评促使进步。教师同学生都可以在五同中互为表率，学生不但在做中学，教师也在做中学。一九三三年夏天巴金来校参观后，在《旅途随笔·庶务室的生活》里这样写：“在这个学校里并没有一个校工。一切工作，日常的和建设的，完全由学生和辅导员自己轮流来做。学校门前的山路和花园，后山的运动场，两三处散落的农场和花圃……无一不是他们的

两手的成绩。”

(2) 师生同学习：学校经政府批准备案，学生必须完成规定的课程才能毕业。语文、数学等文化课先由辅导员作辅导讲解，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课本去研究，我们叫做酌用道尔顿制。博物、农业等课实行教学做的教学法，通过野外和农场的实践，从做中教，从做中学，也是所谓教学做合一。

(3) 师生共同办乡村小学，共同做农村社会改造工作：学生在学校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就分组，几个同学结伴到农村去创办或接办小学兼办农民夜校，逐步发动农民进行社会改造工作。这项工作由晓庄师范学习归来的区巾雄带领到会城附近的天禄乡接办天禄小学作为农村社会改造运动的示范，同时创办农民夜校，教农民学文化兼学农业技术，由劳动大学艺农系毕业的叶渠均当辅导员，负责水稻良种的试验和推广及耕作制度的改革。劳动大学园艺系毕业的梁朝令辅导员负责柑橘改良和推广。促使农民在学文化、学农业技术的农业改革中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生活。于是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阶级斗争，夺取乡村政权，保卫农民利益。正如巴金在《旅途附笔·农民的集会》里所写的那样：“……那些失败了的土豪劣绅便假借金钱和官厅的力量企图夺回他们已失去的权力，然而过去受惯了他们压迫的农民决不肯让他们出来再把持乡政，于是新的斗争又开始了……在长久压迫下面开始觉悟起来的农民，对于他们自身的事情绝不会表示冷淡，许多口在说话，许多简单的意见发表出来……他们举出农会负责人……农会就掌握了乡村政权为农民谋福利。”

巴金参加了农民集会之后第二天，到邻乡“雀墩”参

观，后来写了《鸟的天堂》（即今小鸟天堂）的文章，又回到西江师范学校住了两天。他在新会一共住了十天，有五天在学校过的。他在《途旅随笔》里这样写：“在一个乡村师范里过了五天快乐的生活”，“献身的精神，真挚的友情，乐观的态度，坚决的信仰，这一切把一个像我这样的过客深深感动了。”巴金的感受，也是当时我们全体师生的感受。

西江乡师这种深入农村去发动广大农民向地主阶级作斗争，反动派害怕动摇了他们的政权，国民党反动政府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迫害，使西江乡师工作处处受到限制，不易开展，我们不得不想办法将学校搬到番禺县贫雇农集中区的鱼窝头去展开工作，留下少数人在新会坚持下去。

（四）

一九三五年春，我们把新会簪庄西江乡村师范学校大部份人力迁到番禺鱼窝头去办学。这里周围住着一二十万贫雇农，全是住草屋，没有地主住在这里。我们先办三所小学，附设几间农民夜校，出版农民壁报，展开农民运动。又与贫雇农共同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农业，改善生活，逐步把农民团结起来，使控制这地区的政权，和地主作阶级斗争。

西江乡师师生与农民合办了实习农场，后来扩大到二百多亩，师生亲自与农民并肩耕作，种水稻田百亩，甘蔗和蔬菜地百亩，改良农业生产。

一九三五年夏，中国社会教育社、教育学会乡村建设研究会等四个全国性学术团体联合在广州举行年会，西江乡师

由我代表参加会议并作报告，会中有机会认识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方马严先生。我介绍了西江乡师学习晓庄的情况，会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勸业大学、国民大学、广西大学、广西教育研究所、江苏教育学院等校的教授和专家百余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到鱼窝头我校参观，给我们莫大的鼓舞。

正当我们与当地农民一起展开农村工作的时候，附近的地主阶级害怕农民动摇他们的政权，他们与反动派串通，压迫我们，不得不在一九三五年秋退出鱼窝头，撤到广州南市。至一九三六年西江乡师被迫停办。

（本文根据陈洪有旧稿节录整理）

（上接第34页）

自从巴金来我访问之后，同学中更加爱谈巴金的著作，留心有关所谓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有些同学满口“安那其”，夸夸其谈，好象比克鲁泡特金更无政府主义似的。有位同学春节回乡，他把家里往年门前写着“神荼郁垒”的门神，改写为“劳动神圣”，顿时引起家乡父老们议论纷纷，指责“西江”学生对门神也要造反了，大逆不道。凡此种种现象，加上实行教育改革，引起社会某些人士的揣测，把“西江”作为无政府主义学校。如果这种揣测是实有其事的话，那么，不说广东省民政厅长林翼中，就是新会、番禺两县的县太爷早已把我们作为政治犯来对待了。

西江乡村师范学校的回忆

欧阳可羽

一、前言

西江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西江”)创办于1932年春,设在距江门七公里的篁庄乡。校舍是租用该乡四座欧阳氏族大祖祠及一些附属建筑物,前临篁庄河,有一片田野,江佛公路沿河彼岸而过;背后山丘连叠,翻过小山岭是篁庄乡。学校的环境是优美的,外表却是很平凡。

“西江”开办仅仅四年多,先被新会县政府通过篁庄乡的封建势力强迫迁移,后来到了番禺鱼窝头,仅半年又被番禺县政府下令离境,再迁移到广州市郊南岸泥城地方,三易校址,至1936年终于被迫停办了。当时社会上谣传“西江”是无政府主义的学校,同学也被戴上无政府主义的帽子,直至解放之初,还有成批“西江”同学(如三江乡祥光小学分校校长陈美媛、教师赵某某等四人)接受审查考验,离职检查数月,终以并无组织活动事实而释放。我也曾于1959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和审查中,还作出了关于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检查(在今江门华侨戏院召开的全市干部大会上,市长马梦臣、财贸部长孙宏义主持大会)。然而,党的政策实事求是,我随即得到甄别平反。

我和“西江”的师生关系比较深,1933年入校,学校停办以后,还在辅导员的帮助下继续学习和就业。现在事隔半个

世纪，仅就回忆所及，将当时“西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反映出来；同时“西江”师生尚健在人间者，尚不乏人，希望加以补充和订正。

二、西江乡师创办的缘起

“西江”创办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那时国难深重，东北沦陷，两广陈济棠、李宗仁借着抗日救国，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形成割据局面，却又响应蒋介石的剿共政策，继续逮捕杀戮共产党人，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了社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提倡复古，学校恢复读经，所谓以正学风。“西江”在这种环境下得到备案开办，可能是得到校董名义上的支持。“西江”董事会主席就是“西南政务委员会”的主要人物中央监委的邓泽如（新会人），还有其他董事如国民党中央委员林直勉、伍大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委黄麟书，中山大学教授崔载阳，国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朱勉躬（新会人），广州大学教育学系主任谭祖荫（新会人），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黄凌霜，以及地方著名人士朱赤宽、简清吾、陈恒业、李元燊、黎百强、欧阳耀群等，另外还有创办人並负教务责任的陈洪有、叶渠均、陈毓就、梁朝令、廖百和等也列名校董。照一般道理来说，校董会是负有指导教育方针的责任。不过在我看来，当时只借重这班校董的名义办理申请立案手续而已。数年来未曾见过外面的校董来过学校，学校的一切事务，实际由几位在校校董和兼校长陈洪有以及教师民三决定的。

在当时，“西江”的创办者们都很年青，对国难当头是痛心的，但又无能为力，却抱着一些幻想，试图从改造乡

村，提倡乡村教育做起。因此，在申请立案时，就命名为“西江乡村师范学校”。《学校缘起》便表明了这些思想。《缘起》说：

“我国乡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因此，谈建设事业也好，谈改造社会也好，……必须先从乡村彻底地改造起！改造乡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普及教育。……现在，政治这样混乱，地方事业这样糟糕，完全是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受到教育的缘故。

乡村教育也提倡有年……所谓乡村师范学校……只是抄袭从前办教育的敷衍的方法，在课程表上加多几项新名目，将乡村两字加在师范学校上面罢了；……如果我们将社会改造的重任交给这些学校，还有什么希望呢！实际上办一间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材，要能实地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是不能以普通学校的敷衍方法来办理，必须有特别的训练才行。

我们以为一个改造社会的先导者——一个乡村师范学校出来的学生——至少具有：

（一）研究的精神和实际的学识——……

（二）实行的精神和能力——……

现在循环式的、商业化的、虚伪的教育，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材么？不，不，这是绝对不能的。我们不忍坐视中国社会这样地沉沦下去，我们愿意为乡村教育尽力，因特集合同志创设这所西江乡村师范学校。……

（一）我们实行：1. 科学的教育，2. 艺术的教育，3. 革命的教育，4. 劳动的教育。

（二）我们采用辅导法，不全用课堂讲授制，而酌用“道尔顿制”的研究制。……

“西江”教育的标志，曾以醒目的大字把“革命化、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粉刷在学校外墙上，写在走廊通道上，印刷在学校信笺上。

“西江”的校徽，也以夸张的手法，绘着一个戴竹笠，拿书本的牧童骑在在双角特别长的水牛背上，这一标志，给人们觉得也很特殊的。

“西江”的创办人，吸取上海劳动大学创办人之一匡互生的生产教育思想，吸取陶行知的教育即生活思想，以改造社会为目的。

三、学校的行政机构和经济情况

“西江”的主要创办人是陈洪有、梁朝令、廖北和、叶渠均、陈毓就、刘家沃（贵州省人）、李祖训（广西省人）、张时（云南省人）等，他们都在上海劳动大学毕业，还有朱贤寿（杭州艺专毕业）、梁肇基（上海东亚体专毕业）、张慕良（上海大夏大学）、陈泮、陈昂（中国公学）等。“西江”在1931年已经开始筹办，筹办期间有的人已在新会一些中学（如冈中、一中、师范）充任教师，还在《四邑民国日报》编辑出版《乡村与教育》副刊，有的人与赵文仪（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在新会三江乡开办“商科职业学校”（1931至1932年）。“西江”开办后，即相继集中到“西江”来。他们都是“西江”的辅导员（学生称老师叫辅导员）。以后

相继而来的辅导员，有东北来的杨春天（佛教徒、素食，国立东北大学教育学士），安徽的李春晖（南京三育大学毕业），湖北的王雪林（上海劳动大学毕业），浙江的陈瑜清（法国蒙比利亚大学毕业），广东潮汕的伍禅，北京的洪一苇（国立东北大学毕业、女性），上海的程苏激（复旦大学），北平的马春荃（燕京大学），康乃尔（交通大学，省籍已记不起），还有章乃焕（浙江省人），叶子群（新会县人）等等。以上所有辅导员除廖北和及叶子群，其余都是未婚的。

朱舜葩教授夫妇，朱君略教授夫妇也曾来我校辅导学习，并体验“西江”的学校生活。

“西江”最高权力是“辅导员会议”，后来在1933年下学期宣布的“西江乡师实验新教育的组织系统”，改名为“校务会议”；而辅导员会议则是各部、各组的代表会议（各组有学生参加）。实际上根本没有把校董会列在学校的组织里。陈洪有对外执行校长职务，校内也称他做辅导员。师生同住、同食、同劳动、同商议，生活打成一片；师生也互相叫唤名字，各班级有班主任，但辅导员对各级都一样负责。

“西江”的经费来源没有什么秘密。开办之初，厨房浴室师生动手造；礼堂舞台师生动手建；后山岗上，师生把山腰锄成三块阶梯形的场地，辟作篮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还有一个沙池。山腰间盖起凉亭，以供休憩和瞭望之用。布置在会客室和办公室壁上的油画等美术作品，是辅导员的或朋友送来的。时钟也是辅导员从家里拿来的。图书馆二十多柜图书是辅导员汇集起来的。同学们在阅览室墙上钉几块木板，陈列报纸杂志（杂志期刊约三十种，其中半数足赠

阅的)；当中用几张旧木台连起来，铺上白布，同学们在自己精心劳动和艺术装饰的阅览室里学习，感到额外舒适愉快。

“西江”几位创办者，把自己在新会各中学任教得来的薪水，都拿作学校的开办费，在三江乡“商科职业学校”任教的也是一样。辅导员不拿薪水，学校只负担膳食费用，零用钱也不多拿，典型的例子是刘家沃辅导员，他宁愿一个多月才剪发一次，为学校节省每一角钱。康乃尔辅导员在鱼窝头的时候，一个月只拿两元零用钱。外省辅导员的生活费多是从家乡汇来接济。

学生的学杂费是学校经费主要来源之一，但收费比较低廉，每学期每名学生只收十多元。哥哥给我六十元就解决全学期的膳食费和零用钱了。“西江”的创办者常公开宣称，

“西江”是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建设起来的，同学们则把它称作“西江精神”。

我国著名作家巴金1933年来“西江”参观访问，在《庶务室的生活》一文里描述说：“他们看学校做自己的家庭，辅导员做自己的哥哥。辅导员也是一样，他们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弟弟。这许多哥哥和弟弟愉快地亲切地在一起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手创造这个美满的家庭、美丽的学校。”还说，

“辅导员们完全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全副精力耗费在学校里，同时也拿慷慨的牺牲，使自己碎骨粉身来报答学生的爱护。”（见《旅途随笔》一九五五年上海平明版）

巴金这些话，既真实，又深切。“西江”这群知识分子要追求理想，从事乡村教育事业，在教育改革道路中探索，自己要在经济上作出一些牺牲，在生活上担负一些风险，这

也是当时教育界中一种社会潮流。但那时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社会上一般的人对他们这种精神却多不理解。

四、学校来自农村

“西江”由1932年春开始招生，以后每学期都招收新生和插班生。到1934年招收第四班学生为止，学生总人数约是一百八十名，其中女学生约三十名，各班都有女学生，而以第三班女学生较多。

所谓招生，不如说是“介绍学生”。同学都是通过互相介绍而走到一起来的。学生大部份来自新会县各农村，如三江、天马、天禄、茶坑、深埗、李苑、梧村、七堡、双水、外海、丹灶、沙堆、古井、崖西等乡，也有家住会城和江门的，也有来自鹤山、中山、台山、东莞、茂名等县的，还有来自外省浙江嘉兴的（陈慧英姐弟二人）、广西兴业的（李祖伟）。新会三江乡“商科职业学校”1932年停办后，成批学生转来就读。“西江”学费低廉，生活俭朴，也适宜于农村穷苦青年就读。

学生中还有上海劳动大学附属小学校学生（原新会县农村青年），他们跟随陈洪有到上海去，又回到新会来“西江”继续读书的，如陈宽怀、陈群旺、赵善倡等。还有家住香港的赵光治也来求学。

还可以一提的是杨毅民（茂名县人）同学，他父亲当时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在江门鹅溪里对面的教堂），原在江门读书，在父亲帮助下已经能够阅读英文本《圣经》，而杨毅民却能背离其父的愿望，坚决转到“西江”来。

学生都远离家乡，全部寄宿在学校里，没有走读学生。

五、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西江”也有课程时间表，按规编制。但是，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就各有区别，比如，国文课就不是采用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而是辅导员选取开明书店出版的《活叶文选》作课文。历史课也不是按教科书所编由古代史讲起，而是先讲现代史。动植物课全是辅导员根据实际情况自编教材，同学们听课做笔记，有时就在花圃、菜地或畜牧场里上课，有时采集一些动植物做解剖和制作标本等。这样把书读活了，学习气氛生动活泼。辅导员说是学习“道尔顿制”的教学方法。

另外，课程时间表里没有的，同学们自由组织，不分班级的有“时事研究组”（每周还出《时事简报》贴于壁上）、“社会科学研究组”、“自然科学研究组”、“音乐歌咏研究组”等。参加社会科学研究组的同学还组成通讯社，与福建省泉州平民中学同学用通讯的形式，交流学习心得或作专题讨论。乐器用同学容易买得起的二胡、秦琴、口琴、笛子、洞箫等，丰富了同学们的文娱生活，《伏尔加船夫曲》、《马赛曲》、《国际歌》（当时我们只有国际歌曲谱而没有歌词）一度成为我们校园里的流行歌曲。

还有“世界语学习班”，绝大部分同学要求参加学习，有一段时间在低年级班里设有世界语课，由刘家沃和王雪林辅导员指导学习。有些同学几个月后就能阅读世界语小册子；也出版过世界语壁报，以加强学习兴趣。还有“太极拳练习班”，由曾亲受吴鉴泉先生指导的陈昂辅导员当教练，培养出赵仁访等多位同学称为标兵，长期坚持锻炼。西江篮球队颇有名气，由梁肇基辅导员负责教练，他是上海东